巴金百年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　　〇〇
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　　“熟视无睹　　”。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

>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 ·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 ·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
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
。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
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
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 “文革 ”，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
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
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 “最温和 ” ，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
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
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 “匕首和投枪 ”
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
内心。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

三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姚文元、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
的发展。

他说： “害怕批评和自责 ” “
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 “避免犯错误 ”。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 “
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 “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 ”来自何方， “ “
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

他说： “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 “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 “
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
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 “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 “炮弹库 ”。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 “中央文革小组 ” 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 “棍子 ”
，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 “文革 ”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 “棍子运动 ”。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 “不枪毙 ”
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 “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

“是意大利文? ”我问。

“对。 ”李小林说， “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
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 “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
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 ”
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离。但那时的我，已经在独身抗争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 “人人 ”之外的那个人。

那个倾听巴金诵读《神曲》的记忆，长久地贮存在我心底。我独自隐居乡下山间，决定开始研究中华文化和世
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
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
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 “文革 ”
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

都愿意对你们谈。 “

… … “

六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 ”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 ”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
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
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
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
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
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

但是，由于我目睹过巴金的经历，居然能在大规模的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
100期上的 “宁古塔 ”
。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
》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 “
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 ”巴金说： “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 ”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 “清政府的 ‘文字狱 ’太残酷了！ ”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 “
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 “文字狱 ”。因此他听了之后，便 “ 沉思不语 ”。他在 “沉思 ”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 “一字不差 ”
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 “不由放下书惊叹 ”。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
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
回答灾难的。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
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 “是一身俸两朝的贰臣 ”，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 “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 ”，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

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

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作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其实这些人物的“异见”，是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写道：

>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身上所带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 “海派 ”，章太炎不是 “海派 ”，巴金也不是 “海派 ”。但正是这种看起来 “不落地 ” 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
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 “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 “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 “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
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

版本号 #1
由 admin 创建于 2026-11-05 12:56:04 UTC
由 admin 更新于 2026-11-05 12:56:04 UTC